

臺灣出土十七世紀中晚期日本肥前窯瓷器與其意義

The Meaning of the Discovery of Middle-late 17th century Japan Hizen Ceramics in Taiwan

郭聖偉* Sheng-Wei Guo

摘要

近年來針對臺南安平古堡、高雄左營舊城，以及臺南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等地的發掘，陸續釐清臺灣十七世紀以後的面貌。十七世紀中葉左右，清廷積極防堵明鄭勢力在臺發展。在所頒布的海禁政策與戰亂的雙重影響下，臺灣島內高品質瓷貨開始短缺，只能開始轉向其他海外生產地點尋求貨源。因此在這樣的情勢下，日本九州佐賀縣有田，以及長崎的波佐見等地的陶瓷器，在具備豐富的原料與鄰近市場等優勢下，開始了專業化與規模化的生產，正式邁入蓬勃的外銷時代，並逐漸取代中國原有的海外陶瓷市場。然而，肥前窯瓷器在臺灣歷史時期的考古遺址中，所呈現的數量比例上卻明顯偏少，無法表現出肥前窯瓷器取代中國原有的海外陶瓷市場的趨勢。這種現象與肥前窯瓷器並非透過大規模貿易手段進入臺灣市場有著極大的關連，肥前窯瓷器可能透過小規模填補中國陶瓷器數量上的空缺，以及私人因素而零星購買等方式，伴隨以中國陶瓷器為主的商品進入臺灣市場，因而形成與東南亞遺址出土大量肥前窯瓷器迥異的現象。此外，肥前窯瓷器在不同型態的考古遺址中出現，與該肥前窯瓷器的品項與種類亦有一定程度的關係。筆者希冀透過分析這些不同遺址出土的肥前窯瓷器，重新梳理臺灣地區出土的肥前窯瓷器的脈絡。

關鍵詞：肥前窯、貿易陶瓷、明鄭時期、中日貿易、歷史考古學

* 郭聖偉，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

Sheng-Wei Guo, Ph.D. students,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aiwan'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Fort Zeelandia in Tainan, Old City of Zuoying in Kaohsiung, and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help gradually clarify the appearance after the 17th century.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under the double impact of Maritime Embargo Policy and the continuing war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serious shortage of high-quality porcelain goods in Taiwan in order to prevent Ming Zheng forces from developing in Taiwan; as a result, operators could only look for overseas production sites for sources.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ceramics in Japan, such as Arita, Saga, Hasami, Nagasaki, and other areas, was growing in magnitude and specialization, China's ceramics market had been displaced by Japan's ceramics market. However,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aiwan historical periods, the quantities of Hizen porcelain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normal proportionally, which could not prove the trend that China's ceramics market was superseded by Hizen porcelain. For Hizen porcelain, small-scale filling of the number of vacancies in Chinese ceramics, personal reasons for sporadic purchases, and other channels might be adopted, and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ommodities consisting mainly Chinese ceramics entered the Taiwan market, to form the different phenomenon from a lot of Hizen porcelain unearthed in Southeast Asia Ruins. In addition, Hizen porcelain appeared in different type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items and types of the Hizen porcelain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expected to re-sort the context of the Hizen ceramics unearthed in Taiwa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Hizen porcelain unearthed in these different sites.

Keywords: Hizen kilns, ceramics trade, Ming-Zheng, Sino-Japanese trad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前言

臺灣的歷史時期考古的開展，可溯自 1980 年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導的「澎湖群島古代人類拓殖史的考古研究」和「臺灣早期人及平埔族聚落的考古學研究」等計劃，以及八里十三行與高雄左營舊城等遺址的發掘，¹迄今已三十餘年的發展。陸續幾年以來，臺灣各地的發掘成果頗為豐碩，如臺南科學園區、基隆聖薩爾瓦多城，澎湖風櫃荷蘭城堡，以及宜蘭淇武蘭遺址等，都是極為重要的十七世紀歷史時期考古發掘。由於臺灣的漢人開發歷程，相較於中國大陸地區顯得較晚，宋元時期雖有漢人移墾入居的紀錄，但仍屬少數。至十七世紀初期，隨著荷蘭人招攬閩南地區的漢人前來從事城砦興建、土地開墾，以及農業開發等，以及隨後鄭氏入臺的統治與屯墾等，臺灣的漢人開發與拓展開始進入高峰期。

在藝術史學者與考古學者的努力之下，陸續從過去的考古成果中，明確指出少數幾件屬日本肥前窯瓷器，並非來自於中國，並進一步指出這些標本的可能年代與產地來源，如謝明良教授的〈澎湖發現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介紹幾件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與日本瓷器〉與〈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盧泰康教授與野上建紀教授的〈澎湖馬公港與金門所發現的肥前瓷器〉等文章，詳細的將少數幾件的肥前窯瓷器，自廣大的陶瓷標本中辨識出來，並詳細探討其可能年代與產地。

然而，僅將肥前窯瓷器辨識出來是不夠的，仍需要更進一步的去理解這些肥前窯瓷器，在這個時間、這個地點出土所具有的背景因素與歷史意涵，釐清十七世紀中後期的臺灣與日本之間緊密的貿易依存關係，如盧泰康教授的〈麻六甲的肥前瓷器貿易〉，以及李匡悌與盧泰康教授等人合著的〈試論臺南地區出土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中，釐清了臺南科學園區出土肥前窯瓷器與鄭氏貿易網絡相互關係，並進一步解讀肥前窯瓷器在東南亞間日本、荷人，以及鄭氏等諸多勢力下轉口貿易所形成的貿易網絡；野上建紀教授以肥前窯瓷器流通的情況為基礎，在〈臺灣海峽周邊的陶瓷貿易網絡與大帆船貿易〉論文中，進一步的討論肥前窯瓷器貿易網絡與大帆船貿易關係。因此，筆者希冀透過整合過去的成果與新的考古發現，並運用系統性的方式，將目前臺灣各遺址中出土的肥前窯瓷器進行歸納與統計，對於理解明鄭時期對外貿易有更深一層的進展。

¹ 趙金勇，〈導言〉，《考古人類學刊「臺灣歷史考古」專號》第 76 期（2012 年），頁 1。

壹、臺灣各地遺址所見十七世紀中晚期肥前窯瓷器

臺灣的歷史時期開展時間較晚，屬十七世紀的遺址顯得較為稀少，除舊社聚落外，外來勢力的拓殖主要集中在臺南、高雄、淡水、基隆、澎湖，以及金門等地。這些遺址多與西班牙、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開拓，以及明鄭勢力的發展有著極大的關係。在遺址發掘的過程中，陶瓷器在出土的遺物中，始終占有極大比例，這些陶瓷器之中，便包含產自日本的肥前窯的陶瓷器。雖然曾經出土肥前窯瓷器的遺址絕對不只下列幾個地點，筆者僅以現階段已經公布之資料為基準，以下分別就數個出土地點進行描述，包含臺南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高雄左營舊城、澎湖、金門，以及臺南市區等地：

一、臺南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臺南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內以及其周邊南科液晶電視專區等地，有數個遺址曾經出土十七世紀中晚期日本肥前窯瓷器，目前已知曾出土十七世紀中晚期肥前窯陶瓷器的遺址，包含社內、中寮、埤仔頭，以及新寮等四處。

社內遺址位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的西側，屬原住民西拉雅文化（Siraya），為西拉雅四大社中最大的新港社。在民國九十二年發掘過程中發現了不同材質類型的文化遺留，多屬十七至十八世紀的遺物，其中包含了明確為明鄭時期的「永曆通寶」等遺物。²這些遺物中也包含了數件肥前窯瓷器，這些瓷器多集中出於社內遺址兩處灰坑中，包含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1）、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2）、出土山水紋青花瓶（圖3）、竹枝紋青花杯（圖4），以及雙勾花卉紋青花碗（圖5）等不同類型。³

南科液晶電視專區與樹谷園區的中寮與埤仔頭二處遺址，二處遺址僅有一至二公里的距離，屬舊時古木柵聚落中的一部分，且開發時間較早，其過程與明鄭屯墾勢力發展有極大的關係。在中寮遺址發現了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6）、「日」字鳳紋青花盤（圖7），以及屬「克拉克類型」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8）等三種。⁴而埤仔頭遺址由於尚未整理完畢，目前只有發現開光花草紋青花盤。⁵

中寮遺址的西北側的新寮遺址，與道爺遺址應同屬太爺聚落的範圍，出土了一定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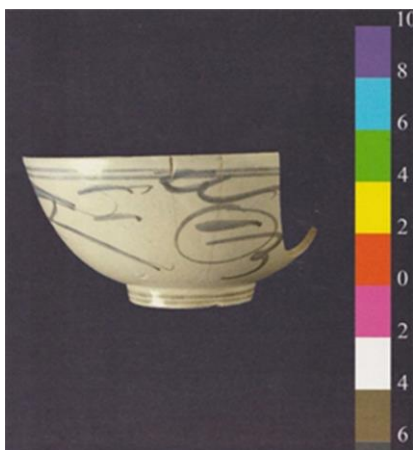
² 盧泰康、李匡悌、王竹平，《臺南社內遺址出土金屬器形制與製作工藝研究》（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2010年），頁86-87。

³ 李匡悌，《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劃期末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年），頁33、42、50、57、60。

⁴ 郭聖偉，《臺南中寮遺址出土陶瓷及相關研究》（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年），頁36、圖47；頁39、圖48；頁112、圖207。

⁵ 臧振華、李匡悌，《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考古遺址受開發影響部分搶救發掘計畫報告》（聯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2011年），頁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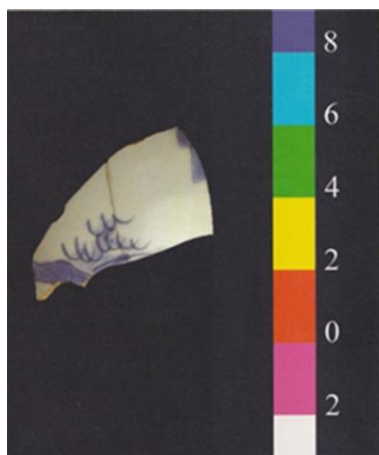
的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 9），根據紀錄，太爺聚落以蘇姓為主要的姓氏，與茄荳鄉白砂崙、路竹鄉大社的蘇姓同源。開臺祖蘇伍，隨任職於鄭軍右虎衛左協的二兄蘇全渡臺後，⁶以業主的身份入墾太爺庄。至清末實施民間聯庄自衛時，蘇家被推為聯庄總理，其職位當時在民間一般被稱為「太爺」，因本庄為聯庄總理太爺所居，故名為「太爺庄」。⁷



【圖 1】社內遺址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圖 2】臺南社內遺址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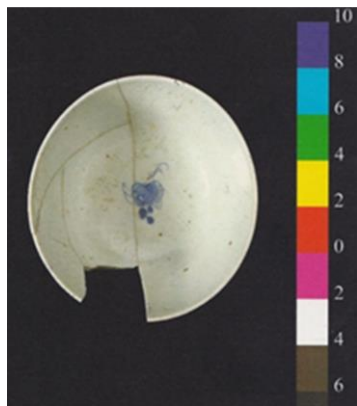
【圖 3】社內遺址出土山水紋青花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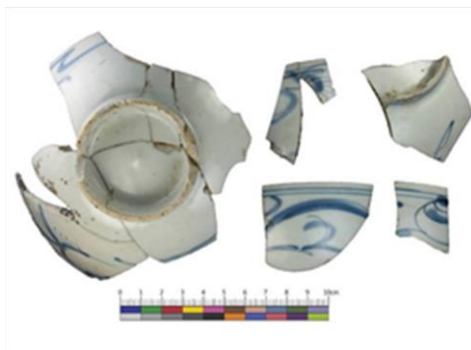
【圖 4】社內遺址出土竹枝紋青花杯

⁶ 劉慧蘭，《十九世紀以前湖內鄉社會經濟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3年），頁61。

⁷ 石萬壽，《台灣早期開發史：雲嘉南地區》（臺北：臺灣省教育廳，1991年），頁136。



【圖 5】社內遺址出土雙勾花卉紋青花碗



【圖 6】中寮遺址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圖 7】中寮遺址出土「日」字鳳凰紋青花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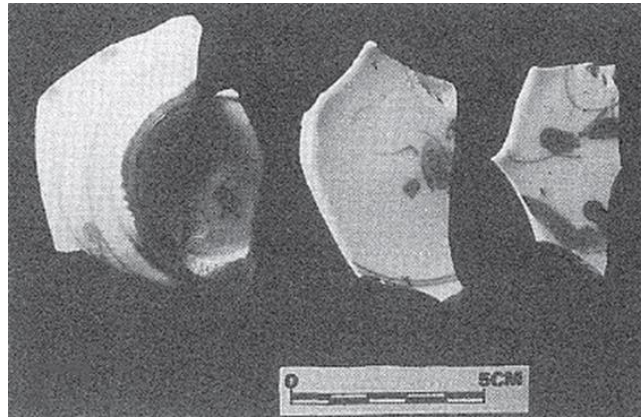
【圖 8】中寮遺址出土簡筆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圖 9】新寮遺址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二、高雄左營舊城

民國七十七年間，位於昔日高雄鳳山舊城東門與南門處，今日永清國小一帶進行發掘，出土數件帶「宣明」款的青花瓷器（圖 10），經藝術史學者謝明良辨識後指出，該類瓷器為日本肥前窯。⁸左營舊城可上溯至明鄭時期，鄭成功於明永曆十五年（1661 年）逐退荷蘭人後，於今日左營地區設置萬年縣做為南路統治中心。鄭經以更加強屯田之制，左營遂成明鄭時期的軍事與農業重鎮，這時期位於左營的屯田地點，就有左鎮庄與前鋒庄兩處。⁹



【圖 10】高雄左營舊城出土帶「宣明」款的青花碗

三、澎湖

2005 年 4 月中旬左右，澎湖馬公港進行水下淤泥浚深，在清理過程中所撈起的海底淤泥中，發現大量宋元時期至近代的陶瓷遺留，其中便包含大量的十七世紀中後半的日本肥前窯瓷器，包含了簡筆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 11）、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 12），以及花草紋青花碗等（圖 13、圖 14）。¹⁰澎湖於十七世紀時一直是明鄭勢力下的統治範圍，明永曆十八年（1664），鄭經正式設立官署，設澎湖安撫司。¹¹同時，馬公港也發現了產自於日本的銅槓，說明澎湖與日本間確有貿易路線存在。¹²馬公港歷經荷蘭、南明、明鄭、滿清等不同勢力多年來的經營，已成為澎湖首要的門戶。

⁸ 謝明良，〈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台灣史研究》第 3 卷第 1 期（1996 年），頁 237。

⁹ 曾光正，〈清代鳳山縣舊城城內空間調查研究〉（高雄市文化局委託，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執行，2011 年），頁 33。

¹⁰ 盧泰康，〈澎湖所見的肥前瓷器〉，《金大考古》第 61 期（2008 年），頁 1-2；謝明良，〈澎湖發現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故宮文物月刊》第 303 期（2008 年），頁 102-113。

¹¹ 連橫，〈臺灣通史〉卷六，（臺北市：眾文圖書，1979 年），頁 144。

¹² 盧泰康，〈澎湖馬公港出水「棹銅」考〉，《南藝學報》第 4 期（2012 年），頁 83-123。



【圖 11】馬公港出水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圖 12】馬公港出水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圖 13】馬公港出水花草紋青花碗



【圖 14】社內遺址出土竹枝紋青花杯

四、金門

金門地方文史工作者林金榮曾於當地採集，採集數件文物中即包含日本肥前產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 15）。國姓爺鄭成功於西元 1646 年即以金門烈嶼作為抗清的根據地，同時掌管鄭氏財政、經理的戶官鄭泰亦駐紮在金門。金門發現之標本可視為西元 1650-1663 年間，鄭氏家族在金門、廈門等地從事陶瓷轉口貿易的證據。¹³



【圖 15】金門採集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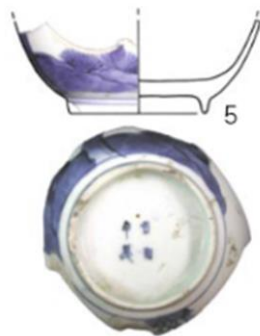
¹³ 盧泰康、野上建記，〈澎湖馬公港與金門所發現的肥前瓷器〉，《史物論壇》第 6 期（2008 年），頁 107。

五、臺南市區

傳世品部分亦有相關發現紀錄，如舊臺南市民族文物館（現今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藏兩件山水樓閣紋青花小罐（圖 16），經盧泰康教授梳理後，確認其為南明永曆 36 年（1682 年）夫人洪氏墓出土陪葬品，係為日治時期於臺南大南門外清理南郊蛇仔穴墓地時所發現；而 1992 年開始的臺南市海安路段「臺南市海安路地下街工程」的廢棄土方中，當地文史工作者採集了大量的民生用陶瓷器，其中一件經盧泰康教授辨識後，確認為肥前窯山水紋青花碗（圖 17），¹⁴臺南市海安路段於清代時屬五條港，為臺南府城內最重要的商業門戶，¹⁵分別由新港墘港、佛頭港、南勢港、南河港與安海港等五條港道，匯聚在一起流入臺南舊運河。¹⁶因此，由海外貿易取得的肥前窯瓷器，及有可能透過此一港道進入臺灣南部市場。



【圖 16】南明夫人洪氏墓出土山水樓閣紋青花小罐



【圖 17】海安路採集山水紋青花碗

六、安平古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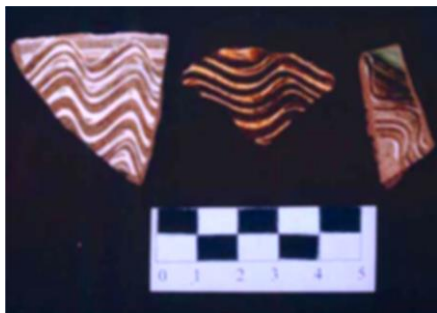
在安平熱蘭遮城遺址中，亦有肥前二彩唐津燒的發現紀錄（圖 18、圖 19），根據《臺灣通史》中記載：「十二月，以熱蘭遮城為安平鎮，改名王城；建桔秩門，志故土也；…。」¹⁷鄭成功於明永曆十五年（1661 年）攻下熱蘭遮城以後，將荷蘭人建築的熱蘭遮城更名王城，做為在臺統治的政治經濟中心。

¹⁴ 上述兩組肥前瓷器整理自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討臺灣歷史》（新北：花木蘭，2013），頁 239-240。

¹⁵ 傅朝卿，《台南市古蹟與歷史建築總覽》（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1 年），頁 274-275。

¹⁶ 范勝雄，《府城叢談（1）》（臺南：臺南市政府，1997 年），頁 57。

¹⁷ 連橫，《臺灣通史》卷二，頁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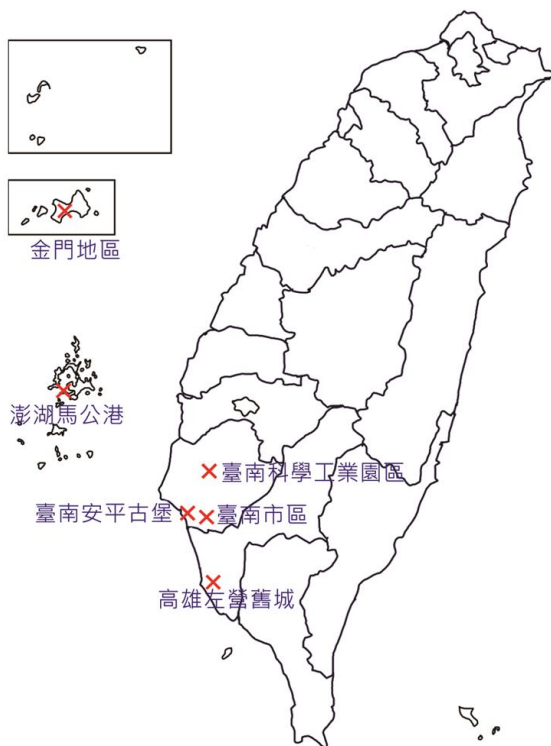


【圖 18】安平熱蘭遮城出土唐津二彩器



【圖 19】安平熱蘭遮城出土唐津二彩器

總計至目前為止，臺灣出土十七世紀日本肥前窯瓷器的地點，大致上包含臺南科學工業園區內各遺址、臺南市區與安平古堡、高雄左營舊城、澎湖馬公港，以及金門等地。藉由十七世紀日本肥前窯瓷器出土遺址分布圖可知（圖 20），大多集中南部地區，並以臺南地區最為集中。此外，出土類型也以臺南地區最為豐富。



【圖 20】十七世紀日本肥前窯瓷器出土遺址分布圖

貳、臺灣出土十七世紀肥前窯瓷器類型

肥前窯瓷器創燒於十七世紀初期，據傳文祿慶長之役（1592-1598）時，帶回朝鮮的陶工，而開始了瓷器的生產。早期肥前窯紋飾題材多仿造中國青花樣式為主，後期則陸續融合諸多元素，最終開創屬於肥前的自我風格。

肥前窯瓷器的製作技術工藝上，與中國陶瓷器有著一定程度的差異。以瓷器為例，主要的差異特徵在於紋飾的筆墨運用、母題的風格，以及落款的書寫方式等，藉由觀察上述工藝特徵判別出中國、日本，以及東南亞等不同產地陶瓷器的差異。十七世紀中期的肥前窯瓷器，由於有田地區的窯工尚未能有效的掌握青花瓷器的製作技巧，這時期的肥前窯瓷器多呈現鈷料灰淡、釉面起泡、燒成溫度的掌控亦不夠成熟，時有燒成溫度不足的現象產生；在筆墨的運用特徵上，肥前窯瓷器多不勾勒輪廓，多以深淺墨色直接繪畫母題，與中國瓷器注重筆墨的起落、頓挫、轉折與濃淡分色仍有一段差距，多重線描與分水重疊繪染；紋飾母題方面較中國瓷器更為抽象化，常見簡筆風格；落款部份，由於肥前的窯工對於漢字與中國政治狀況並不熟悉，因此除了中國瓷器常見的「成化年製」、「宣德年製」，以及「大明嘉靖年制」，亦出現複合而成的「宣明」或者「宣明年製」、「大明年製」等不完整的中國年代落款，¹⁸其中「製」字書寫方式往往與中國不同。

臺灣各地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中晚期肥前窯瓷器，依照其紋飾、器型等特徵的差異，可區分出幾種不同的類型，透過分析與比對各種類型的肥前窯瓷器，在其產地與海內外出土案例，可以更進一步理解各類型肥前窯瓷器的造型與特徵。以下就各類型十七世紀中晚期肥前窯瓷器分別說明：

一、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這類型為模仿中國晚明景德鎮窯錦地開光紋青花克拉克瓷盤。此類紋飾在日本又稱「芙蓉手」，專供外銷之克拉克瓷器。依據出土品來看，大致可分精細與簡筆二類：金門與臺南社內發現者為精細類型，器型特徵為敞口，折沿，弧壁，青花發色藍中帶紫，盤外壁飾簡筆開光紋，盤內壁飾錦帶開光花卉紋、傘紋，鈷料發色濃艷，胎色淨白，胎釉品質亮好，釉面孔隙較少；臺南中寮與埤仔頭出土者則為簡筆類型，造型特徵為敞口，斜壁，弧腹，器壁略折，下接圈足，足壁內斜外直，盤心飾折枝花草，沿側簡筆開光，內飾花草，間以簡筆小開光，鈷料發色灰黑偏淡紫，胎色灰黃，胎釉品質低下粗糙，釉面多帶孔隙。

目前已知燒製精細類型的窯址包含日本內山諸窯，以及外尾山窯 3 號窯跡（圖 21）、

¹⁸ 大橋康二，〈十七世紀後半における肥前磁器の銘款について：長吉谷窯出土品を中心として〉，《東洋陶磁》第 17 期（1989 年），頁 25-27。

猿川窯、榑古場窯，以及柿右衛門窯（圖 22）等，海外出土同類型的遺物例見印尼爪哇島萬丹（Bantam）遺址、¹⁹菲律賓馬尼拉市王城區（Intramuros）（圖 23）、爪哇島巴達維亞咖啡園路（Jalan Kopi）遺址（圖 24）、²⁰瓜地馬拉安地瓜（Antigua）之聖多明哥成修道院（Catedral de Santiago）（圖 25），²¹以及墨西哥市大神廟（Templo Mayor）（圖 26）²²與維拉克魯斯州（Veracruz）等地。²³日本國內亦有發現，如日本薩摩半島鹿兒島縣東部吹上濱海域即採集到一定數量的開光花草紋青花盤。²⁴



【圖 21】外尾山窯窯跡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圖 22】柿右衛門窯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¹⁹ 大橋康二、坂井隆，〈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82 期（1999 年），頁 71，第 5 圖 99。

²⁰ 野上建紀、Alfredo B. Orogo、田中和彦、洪曉純，〈マニラ出土の肥前磁器〉，《金大考古》第 48 期（2005 年），頁 5-9。

²¹ George Kuwayama, and Anthony Pasinski,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Audiencia of Guatemala”, *Oriental Art*, Vol. XLVIII, No. 4, 2002, p. 30, fig. 8. 原文認為該遺址出土之遺物為中國製品，但盧泰康教授認為少有三件標本的紋飾與青料勾染特徵，應屬日本肥前磁器。

²² 野上建紀、Eladio Terreros、George Kuwayama、Jose Alvaro Barrera Rivera、Alicia Islas Dominguez、田中和彦，〈太平洋を渡った陶磁器? メキシコ発見の肥前磁器を中心に〉，《水中考古学研究》第 2 期（2006 年），頁 88-105。圖版修改自野上建紀，〈台灣海峽周邊的陶瓷貿易網絡與大帆船貿易〉，《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論文》（未出版，2012 年），圖 10。

²³ 野上建紀、Judith Hernández Aranda，〈ベラクルス出土の肥前磁器〉，《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第 32 期（2011 年），頁 48，圖 3。

²⁴ 大橋康二，〈鹿兒島県吹上浜採集の陶磁片〉，收於三上次男博士喜寿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会編，《三上次男博士喜寿記念論文集》陶磁編，（東京：平凡社，1985 年），頁 275-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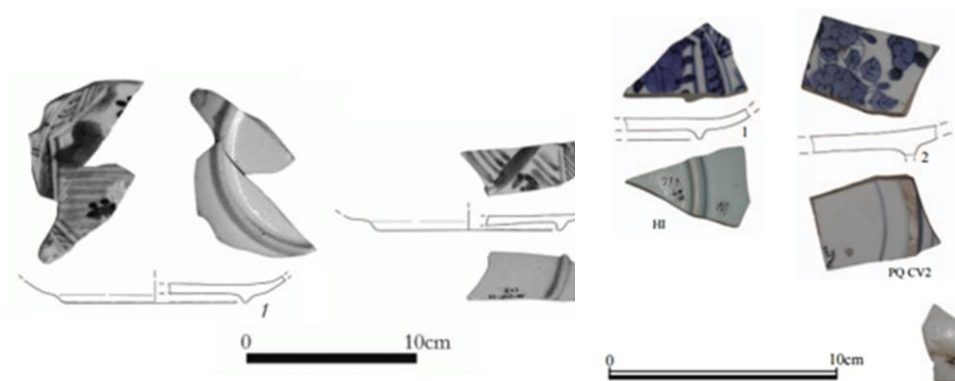
【圖 23】菲律賓馬尼拉市王城區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



【圖 24】咖啡園路遺址出土開光花草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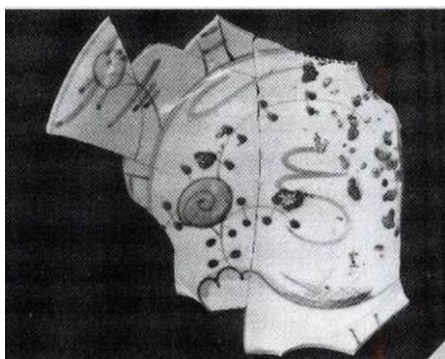


【圖 25】聖多明哥城修道院出土開光花草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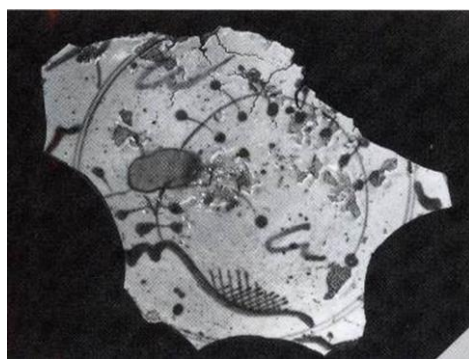


【圖 26】菲律賓馬尼拉市王城區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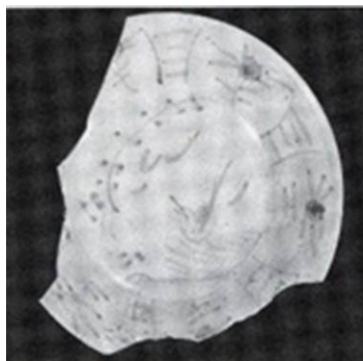
簡筆開光花草類型盤的窯址包括日本外山地區的多々良の元窯 A 窯址（圖 27）、弥源次窯跡（圖 28）、広瀬向窯（圖 29）、以及外尾山窯、²⁵吉田窯（圖 30）川猿窯、榊以及古場窯等地之間。²⁶同類型的遺物，在海外亦有所見，如印尼叭沙伊干（Pasar Ikan）遺址（圖 31）、菲律賓馬尼拉市王城區西班牙時期遺址（圖 32），以及中美洲墨西哥市等地。²⁷日本當地學者研判，這類克拉克瓷器生產年代，大約落在西元 1650 至 1670 之間。²⁸



【圖 27】多々良の元窯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圖 29】広瀬向窯跡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圖 28】弥源次窯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盤



²⁵ 村上伸之、野上建紀編著，《有田の古窯—町内古窯跡詳細分布調査報告書第 11 集》（佐賀県：有田町教育委員会，1988 年），頁 160-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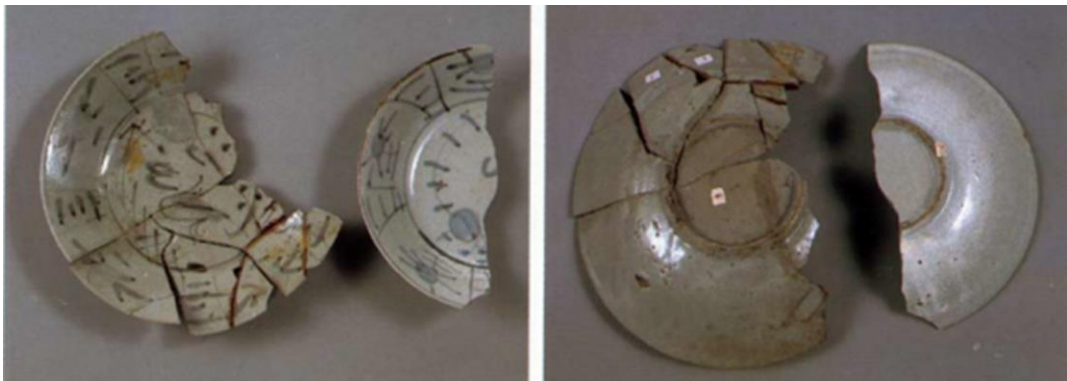
²⁶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頁 237。

²⁷ 盧泰康、野上建紀，〈澎湖群島・金門島発見の肥前磁器〉，《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第 30 期（2003 年），頁 4。

²⁸ 大橋康二，〈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海を渡っ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佐賀県：佐賀県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90 年），頁 158-160。



【圖 30】吉田 2 號窯跡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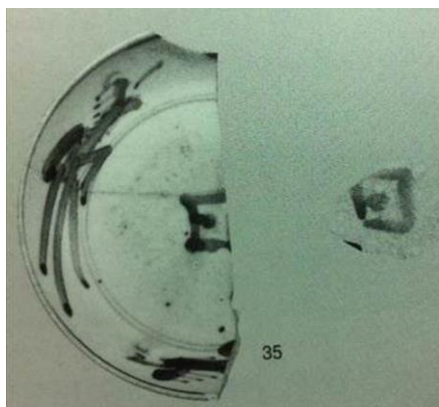
【圖 31】印尼叭沙伊干遺址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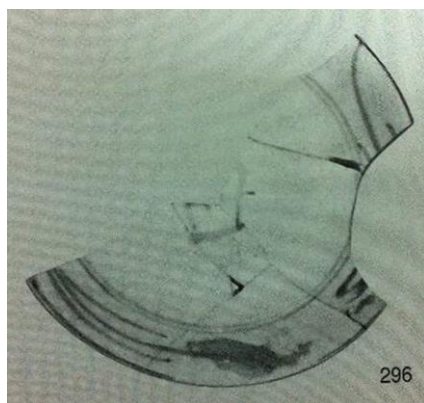
【圖 32】菲律賓馬尼拉市王城區西班牙時期遺址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二、「日」字鳳凰紋青花盤

這類青花盤紋飾特徵為口緣處飾三組長尾鳳紋，盤心飾一日字，呈三鳳繞日狀，臺灣目前僅中寮遺址僅發現一件。此類型器日文做「染付日字鳳凰文皿」，為日本肥前地區輸出外銷用途的青花瓷器，日本本地如東京大學理學部7號館地點出土案例。²⁹越南會安潘朱貞（Phan Chu Trinh）遺址（圖33），錦鋪亭（Dinh Cam Pho）第2地點河床遺址（圖34），以及印尼叭沙伊干（Pasar Ikan）等，³⁰皆有相關案例出土紀錄。根據日本當地學者推定年代，大抵在西元1640至1650之間。³¹而在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淡路町二丁目遺跡出土的「日」字鳳凰紋青花盤，則有明確的年代依據，為明曆三年（1657年）大火後所遺留（圖35）。目前已知生產「日」字鳳凰紋青花盤的地點以日本有田地區為主，包括內山地區的楠木谷窯跡（圖36）、枳藪窯跡、³²天狗古窯跡（圖37）、年木谷3號窯跡（圖38）、小樽2號窯跡（圖39），以及外山地區的掛の谷窯跡2號窯址、³³山辺田窯跡1號、2號窯址等地點（圖40）。



【圖33】潘朱貞遺址出土日字鳳凰紋青花盤



【圖34】錦鋪亭遺址出土日字鳳凰紋青花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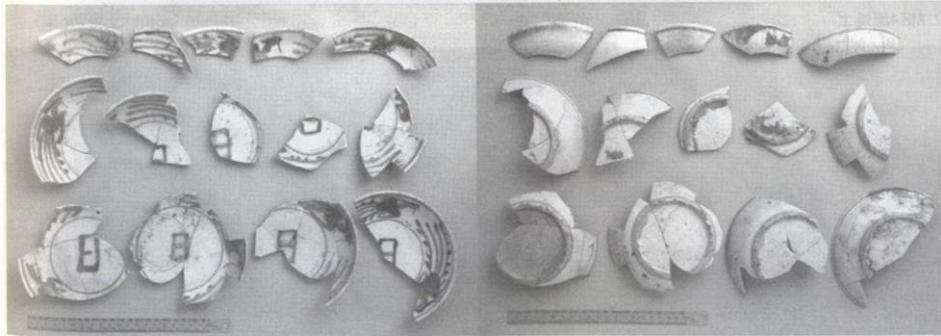
²⁹ 東京大学埋蔵文化財調査室，《東京大学本郷構内の遺跡理学部7号館地点》（東京：東京大学埋蔵文化財調査室，1989年），頁109，圖6n。

³⁰ 大橋康二，〈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頁95，圖136。

³¹ 村上伸之、野上建紀編著，《有田の古窯—町内古窯跡詳細分布調査報告書第11集》，頁20、188、208。

³² 同上註，頁20-26，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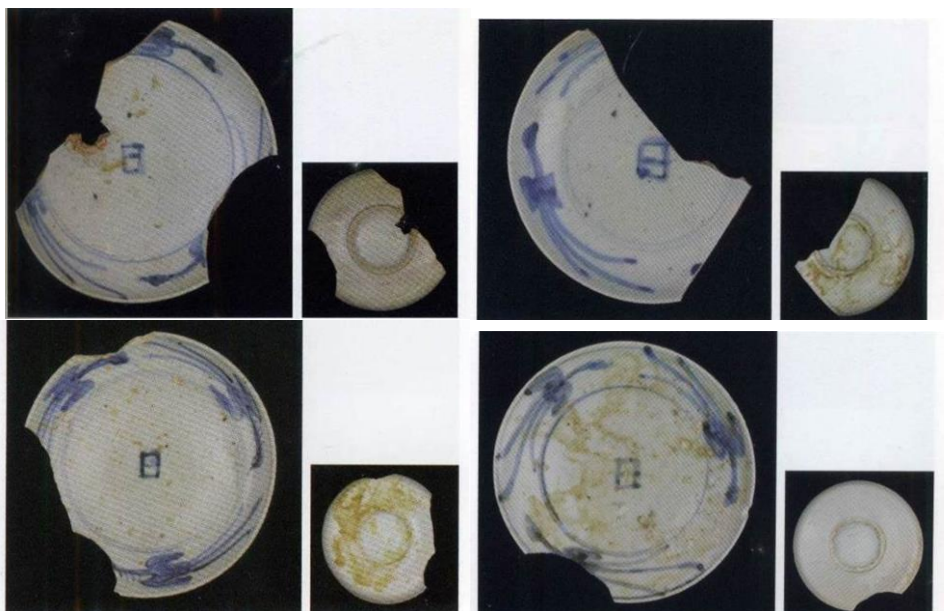
³³ 同上註，頁188-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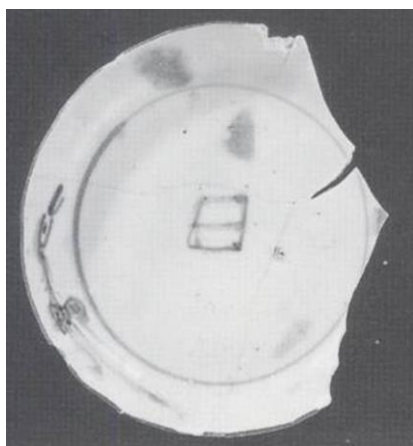
【圖 35】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淡路町二丁目遺跡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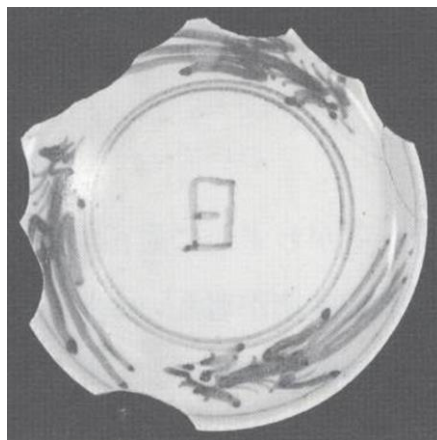
【圖 36】楠木谷窯跡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



【圖 37】天狗古窯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



【圖 38】年木谷窯跡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



【圖 39】小樽窯跡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



【圖 40】山辺田窯跡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

三、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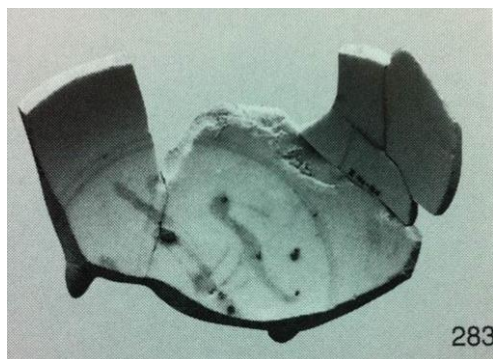
此類紋飾在日本又稱「荒磯文碗」。造型特徵為直口，弧壁，下接圈足，足壁內外皆細直。外壁施簡筆雲龍紋，青花發色普遍灰藍，紋飾繪製技法與中國傳統有所差異，多以線描、分水重疊繪染。海外出土案例豐富，如泰國大城府(Ayutthaya)昭披耶河(Chao Phraya)打撈遺物(圖 41)、越南會安(Hoi An)錦鋪亭(Dinh Cam Pho)第 2 地點河床遺址(圖 42)、其中又以越南潘朱貞遺址出土類型最為接近(圖 43)，此類紋飾大約在十七世紀中期開始流行，推定年代上大抵在西元 1650 至 1680 之間。³⁴而外銷時間可能延續至十七世

³⁴ 有田町教育委員會，《国史跡天狗谷窯跡：史跡肥前磁器窯跡(天狗谷窯跡)保存整備事業報告書》(佐賀県：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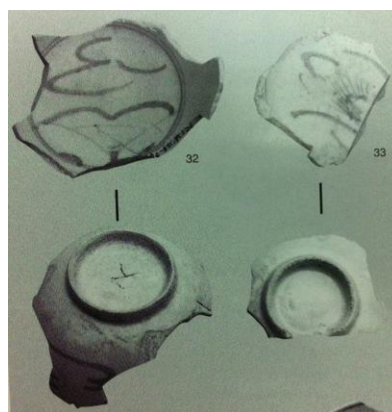
紀末，如福建東山冬古灣沉船（圖 44），以及 1690 年代的沉沒的頭噸號（Vung Tau）沉船貨物中，也有大量此類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 45）。此外，在鹿兒島縣東部吹上濱海域，也曾發現大量的帶款紋的筆雲龍紋青花碗，伴隨諸多不同紋飾、器型的其他日本陶瓷器。³⁵關於這類瓷器，主要燒製窯址主要為日本的有田地區，多分布在內山的泉山、白川等地區、以及外山地區的応法、黑牟田等地，其中又以応法、黑牟田等地區最為集中。目前已知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的窯址包括弥源次窯跡（圖 46）、多々良の元窯 C 窯址（圖 47）、天狗谷窯跡（圖 48）、波佐見窯、嬉野窯、三川內諸窯等，³⁶以及南川原地區古窯址等（圖 49），都有相關發現。



【圖 41】泰國大城府附近湄南河畔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圖 42】會安錦鋪亭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圖 43】潘朱貞遺址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有田町教育委員会，2010 年），頁 183。

³⁵ 大橋康二，〈鹿兒島縣吹上浜採集の陶磁片〉，頁 275-291。

³⁶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頁 238。



【圖 44】冬古灣沉船出水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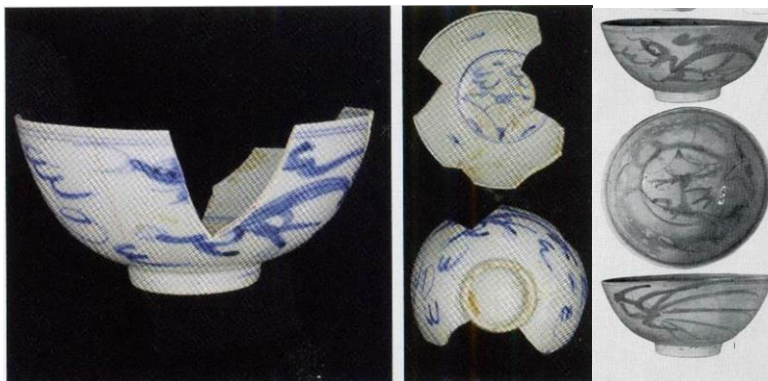
【圖 45】頭噸號沉船出水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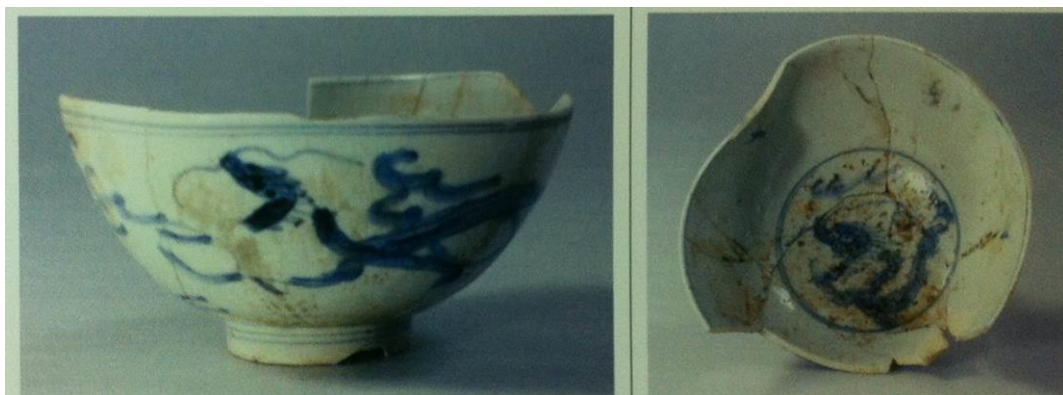
【圖 46】弥源次窯跡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圖 47】多夕良の元窯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圖 48】天狗谷窯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圖 49】南川原地區古窯跡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四、竹葉紋青花杯

以社內遺址為代表，這類瓷器造型特徵為撇口，斜肩，斜壁，弧腹下接圈足，足底切修細緻，青花發色良好，釉色透亮，器外壁描繪竹枝紋，紋飾描繪精細，底有落款。

五、雙勾花卉紋青花碗

以社內遺址出土者為例，造型特徵為直口，斜壁，斜弧壁，弧腹，足壁高直，器外壁描繪雙勾花卉紋，底心飾一團花紋，足底帶款，青花發色清淡，釉色青中帶灰。日本肥前窯產地出土之類似「宣明」款花草紋碗，可見於佐賀縣西松浦郡有田町幸平遺跡 A-3 區 5a 發掘遺物。

六、山水紋青花碗

以臺南市海安路地下街工程出土者為例，口緣殘缺，弧壁，下接圈足，圈足徑 50mm 左右，足高 7mm，青花發色藍中帶紫，以分水法暈染紋飾，外壁近圈足處飾坡石草葉紋。圈足內有四字二排直書「宣明年製」青花款，字形筆劃簡化，不易辨識。

七、花草紋小罐

以今日鄭成功文物館藏為例，器形特徵為撇口，細頸，斜肩，弧腹，下接臥足，器底底心尖突，並帶細微開裂紋。施釉及底，青花發色藍中帶灰，器身上下勾畫藍圈，內繪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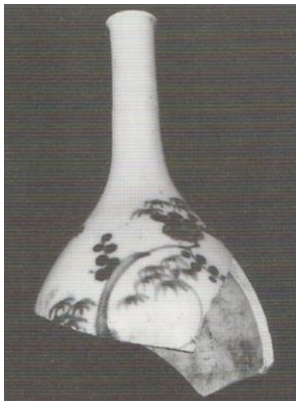
筆山水紋。海外類似的案例，例見泰國洛坤府的濤坤寺（Wat Thao Khot）（圖 50）。



【圖 50】泰國洛坤府的濤坤寺出土之花草枝鳥紋小罐

八、山水紋青花瓶

以社內遺址出土者為例，僅存部分器壁，弧壁，器身外壁描繪山水紋，青花發色良好，紋飾描繪細緻，胎色透亮，內壁無釉。殘高 3.5 公分。類似日本窯址發現遺物，可見有田町外山地區多多良之元窯跡 C 窯址。³⁷但該件標本年代稍晚，為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的產品（圖 51）。³⁸



【圖 51】有田町外山地區多多良之元窯跡出土山水紋青花瓶

³⁷ 村上伸之、野上建紀編著，《有田の古窯—町内古窯跡詳細分布調査報告書第 11 集》，頁 232、240、214，圖 8。

³⁸ 李匡悌、盧泰康、朱正宜、臧振華，〈試論台南地區出土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2005 年台灣考古工作會報》（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6 年），頁 10-9，註 13。

九、唐津二彩陶器

一般將這種陶器稱為「二彩唐津」，以臺南安平熱蘭遮出土者為例，為盤類器壁部位，內壁施以白色化妝土刷抹波浪形複線紋飾帶，上方施以綠彩與褐彩而後，施罩透明釉燒成，³⁹屬九州肥前地區唐津窯燒造，燒製年代約在 1660-1680 年左右，類似唐津燒盤形器已出土於東南亞多個國家，如泰國拉布里（Lop Buri）宮廷接待所，以及馬來半島那空是貪瑪叻（Nakhon Si Thammarat）等遺址有出土紀錄。⁴⁰相關案例，可見於日本東京根津美術館館藏（圖 52）。



【圖 52】根津美術館藏二彩唐津燒盆

參、十七世紀中晚期日本肥前窯瓷器所具有的貿易內涵

臺灣現階段出土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窯瓷器，主要發現於臺灣南部、澎湖，以及金門等地，若加上日本本地以外的海外地區，可明顯觀察出出土肥前窯瓷器的地點，皆屬明鄭勢力範圍，或者是明鄭貿易網絡的一環；同樣屬臺灣十七世紀重要遺址的宜蘭淇武蘭，則未有發現肥前窯瓷器的蹤跡。這一原因可能顯示明了鄭勢力尚未到達臺灣東北宜蘭一代，以及肥前窯瓷器數量並不足以深入貿易至臺灣東部地區等。而發現的肥前窯瓷器年代落在十七世紀中期至晚期，也就是 1650 至 1690 年左右，與鄭氏勢力在臺經營的時間符合。因此，日本肥前窯瓷器的向外傳播，與明鄭勢力的發展有著絕對的關係，而肥前窯瓷器品項

³⁹ 謝明良，〈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日本和東南亞陶瓷〉，《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第 30 期（2009 年），頁 5。

⁴⁰ Sawang Lertrit And Kritsada Pinsi Pariwat Thammapreechakorn, *Ceramic Art in Thailand.*, Bangkok:Osotspa Co., 1996, 119.

多元，但在臺灣出土數量卻相當稀少，這可能反映了日本肥前窯瓷器在此時做為大量輸出國外的國際貿易品，但卻無法完全開拓臺灣市場的狀況。

清廷為杜絕海上走私貿易，於 1656 年頒行海禁令，以及一連串強硬的海禁政策與遷界措施，對中國陶瓷的海外輸出事業造成不小的影響。鄭氏以臺灣與周邊的島嶼為中心，向周邊的勢力進行多邊貿易，以確保能夠獲得充足的物資。⁴¹臺灣與日本之間的貿易路線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作為在遺址地點出土的日本瓷器，顯示當時臺灣與日本之間具有明確的貿易關係，同時也反映瓷器作為雙向貿易的貿易品之一。此外，也顯示臺灣作為長崎與東南亞各都市之間（如馬尼拉）的轉口貿易地位。⁴²如同菊池誠一教授曾針對越南會安錦鋪亭遺址出土瓷器進行產地來源之統計比較，在部分地點肥前窯瓷器數量可達一成以上，甚至偶有超過中國南方各窯口之勢，顯示明清交替之際，肥前窯做為填補中國瓷器外銷短缺之用。⁴³在中寮地點發現的日本肥前窯瓷器，在數量上明顯無法與其他窯口所生產之陶瓷做比較，僅占將近千分之一。而在周邊的其他遺址中，⁴⁴也是以如此「少品項、少數量」的情況出現，以這樣懸殊的比例，若解釋為明鄭勢力因受到清政府海禁之影響下，填補瓷器需求之空缺的對象，其數量仍嫌過少，以中寮遺址為例，肥前窯瓷器僅占不到全遺址出土瓷器的 0.002%。此一現象在文獻中可見一些端倪，如 1665 年至 1684 年間，由日本輸出自馬尼拉的瓷器紀錄，數量不超過一萬件，⁴⁵與中國製品的數量有著極大的差距，瓷器自始至終，都未做為對日貿易的主要對象。如菊池教授所指出之現象，尚未明顯出現在中寮地點或者其周邊相關漢人遺址之中，而臺灣其他地點的明鄭遺址，是否出現此種狀況，則有待日後進一步的研究與討論，至少在目前為止，臺灣尚未有遺址發現「大規模」的肥前窯瓷器。

因此，筆者推論，明鄭時期自日本輸入的瓷器的原因，並非完全作為大規模貿易下的商品而進到臺灣市場：一部分的肥前窯瓷器，透過小規模的交易模式下，填補貿易空缺，以及轉口貿易的需求僅占部份；另一部分日本瓷器，為滿足私人（尤以赴日貿易人員）需求而購置，並非大量採購，隨貿易船隊返臺後，在消費地使用者難以辨明窯口的情況下，伴隨大量來自於中國南方各窯口產品，一同進入臺灣市場或者其他擁有者手中。因此，各地遺址所能得到的肥前窯瓷器必定形成「類型少、數量少」的狀況，僅有寥寥數件的狀況出現。

⁴¹ 盧泰康，〈明代中國陶瓷外銷的歷程與分期〉，收於沈瓊華主編，《2012 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古代瓷器輸出及文化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 年），頁 410。

⁴² 盧泰康、野上建紀，〈澎湖馬公港與金門所發現的肥前窯器〉，頁 98。

⁴³ 菊池誠一，〈ベトナム・ホイアン考古学 調査報告書〉，頁 37-61。

⁴⁴ 如臺南科學工業園區周邊的社內、新寮等遺址。

⁴⁵ 方真真，〈明鄭時代台灣與菲律賓的貿易關係-以馬尼拉海關紀錄為中心〉，《臺灣文獻》54 卷第 3 期（2003 年），頁 59-105。

而在目前臺灣的考古案例中，僅就「簡筆雲龍紋青花碗」這一類出土案例中較為常見，可能即透過小規模交易模式而進入臺灣市場；而其餘的類型，則可能為上述第二種模式，透過個人攜帶等方式進入臺灣，因此只有零星的出土記錄。海外沉船的部份，也多發現於東南亞路線的沉船，如 1690 年代的沉沒的頭噸號貨物中，大量的簡筆雲龍紋青花碗也證明了這類紋飾的肥前窯瓷器是貿易出口大宗，而隸屬明鄭的冬古灣沉船上發現的簡筆雲龍紋青花碗，也顯示明鄭勢力的船艦，確實將這類瓷器做為「日常用品」在進行使用。此外，在東南亞地區各個出土肥前窯瓷器的遺址，都有安平壺伴存出土的現象。而上述臺灣各地出土肥前窯瓷器的遺址，安平壺伴隨出土的現象也非常普遍，這樣特定的出土遺物組合，顯示在十七世紀的國際貿易中，鄭氏勢力的開發與貿易政策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⁴⁶

而除了安平壺之外，高雄左營舊城、臺南科學園區的社內、中寮，以及埤仔頭等四處遺址，皆出土自銘帶年號款的秋葉紋青花盤，依據其銘文可整理出這些秋葉紋青花盤的年代均落在西元 1664 年至 1679 年之間，大抵與明鄭政權在臺的時間吻合（表 1）。這樣的特殊瓷器組合，也更進一步顯示肥前窯瓷器與明鄭勢力的緊密關係。

表 1、臺灣出土帶年號款秋葉紋青花盤一覽表：

出土位置	干支紀年	西元紀年
高雄左營鳳山舊城	己卯年	1675
臺南新市社內	丙辰年	1676
臺南新市中寮	丁未年	1667
	壬子年	1672
	丙辰年	1676
臺南新市埤仔頭	甲辰年	1664
	己未年	1679
	壬子年	1672

⁴⁶ 坂井隆，〈肥前磁器（伊万里）の発展と 17 世紀後半のアジア陶磁貿易出土資料〉，《田野考古》第 9 卷（1、2 期合刊）（2004 年），頁 32。

肆、結語

前述發現肥前窯瓷器的各個遺址，皆屬十七世紀中期至晚期階段，其中又以臺灣南部地區發現數量最為豐富，與明鄭勢力範圍有絕對的關係。這些遺址之中，又屬西拉雅新港社的社內遺址所出現肥前窯瓷器的樣式最為多樣，但每一種樣式的數量卻又相當少，相較於如臺南中寮遺址，總計只有出土三種類型，但單一紋飾的數量亦可達到十數件。這樣兩極化的分布，可能與聚落類型有極大的關係，盧泰康教授曾提出肥前窯瓷器在於不同型態的考古遺址中出現，與該肥前窯瓷器的使用方式有相當大的關係。⁴⁷若以上述各遺址型態進行個別分析，可以歸納出平埔族聚落、漢人屯墾聚落、行政中心、運輸海道，以及官宦墓葬等五種類型（表 2）：

臺南新市社內遺址屬西拉雅族聚落，為史籍中平埔族新港社所在，為目前為止，臺灣考古遺址中出土肥前窯瓷器「類型」最多者，但每類數量少，皆只有一件。

臺南新市中寮、新寮屬漢人屯墾聚落，為目前為止，臺灣考古遺址中出土肥前窯瓷器「數量」最多者，如簡筆雲龍紋青花碗數量就達十數件。高雄左營舊城亦屬漢人屯墾聚落，出土數量較少，僅知發現三件。這個趨勢可能與消費地的距離有關，以及受到遺址數量、發掘規模大小的影響。

臺南安平古堡為鄭氏行政中心所在，理當發現最為精緻的高品質、做工精細的瓷器，但到目前為止的發掘成果，日本陶瓷器多以肥前窯二彩唐津燒為主。

臺南市海安路段舊時屬運輸海道，出土數量較少，目前僅發現一件，但海安路段未經過正規考古發掘，可能有所影響；澎湖馬公港與金門發現的肥前窯瓷器，各類型的肥前窯青花瓷器都偶有發現，但數量上也屬少數。

臺南南門外南明洪夫人墓屬官宦士人墓葬，該地發現之山水紋青花瓶是目前臺灣考古遺址中唯一之案例。

⁴⁷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頁 260-261。

表 2、臺灣出土十七世紀肥前窯瓷器遺址與其類型一覽表：

出土地點	遺址類型	出土類型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中寮遺址	軍屯聚落	日字鳳紋青花盤、簡筆雲龍紋青花碗、簡筆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新寮遺址	軍屯聚落	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社內遺址	平埔族聚落	開光花草紋青花碗、山水紋青花瓶、竹枝紋青花杯、雙勾花卉紋青花碗
臺南市區海安路段	運輸港道	山水紋青花碗
臺南南門外南明洪夫人墓	官宦墓葬	山水樓閣紋青花小罐
臺南安平古堡	行政中心	唐津二彩器
高雄左營舊城	軍屯聚落	帶「宣明」款花草紋青花碗
澎湖馬公港	運輸港道	開光花草紋青花盤、花草紋青花碗、簡筆雲龍紋青花碗
金門地區	運輸港道	開光花草紋青花盤

綜上所述，漢人與平埔族兩者飲食習慣上的差異，以及不同的交易模式，可能導致如此不同的差異。此外，特定類型的肥前窯瓷器，其消費者取向可能也有所不同，如開光花草紋青花盤這一類瓷器，精細類型僅出現在港道，以及平埔族聚落，漢人可能就較少使用該類型的瓷器；最普遍出現的雲龍紋青花碗，在日本國內產量也最為豐富，因此更能深入一般漢人社會；而如山水紋青花瓶與二彩唐津燒這類較稀有的肥前窯瓷器，可能掌握在社會階層較高的統治階層手上，因此並未出現在一般的漢人屯墾聚落。

目前關於臺灣出土的肥前窯瓷器，日本學者山本盤男曾提出肥前窯瓷器主要可以從生產地、消費地，以及貿易網絡等三個視點來著手研究，⁴⁸透過不同的研究視點，可以展開更多的研究議題，但不可避免的，仍需要更多遺址出土資料來輔助，並持續關注這一相關議題，如此方能於在臺灣出土的肥前窯瓷器脈絡做出更精確的判讀，並更進一步認識肥前窯瓷器在全球海外市場的貿易內涵。此外，臺南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內仍有數個遺址有肥前窯瓷器的出土紀錄，但由於現階段尚未整理完畢而尚未公布，待日後這些資料整理完畢，對於南科地區明鄭時期的研究能夠更臻完整，對於臺灣地區出土的肥前窯瓷器脈絡也更為清晰。

⁴⁸ 山本盤男，〈近世肥前磁器輸出に關する經濟史研究の成果と課題〉，《九州産業大学柿右衛門様式陶芸研究センター論集》（福岡：九州産業大学柿右衛門様式陶芸研究センター編集委員会，2005年），頁264。

圖版目錄

- 【圖 1】社內遺址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劃期末報告》，2005 年，頁 33。
- 【圖 2】社內遺址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同上，頁 50。
- 【圖 3】社內遺址出土山水紋青花瓶。圖片來源：同圖 1，頁 60。
- 【圖 4】社內遺址出土竹枝紋青花杯。圖片來源：同圖 1，頁 57。
- 【圖 5】社內遺址出土雙勾花卉紋青花碗。圖片來源：同圖 1，頁 42。
- 【圖 6】新寮遺址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新寮遺址搶救發掘研究計畫期末報告》，2010 年，頁 111。
- 【圖 7】中寮遺址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圖片來源：《臺南中寮遺址出土陶瓷及相關研究》，頁 39。
- 【圖 8】中寮遺址出土簡筆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同上，頁 36-37。
- 【圖 9】中寮遺址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同圖 7，頁 114。
- 【圖 10】高雄左營舊城出土帶「宣明」款青花碗。圖片來源：〈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試掘〉，2008 年，頁 1-2。
- 【圖 11】馬公港出水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澎湖群島・金門島発見の肥前磁器〉，2003 年，頁 91。
- 【圖 12】馬公港出水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同上。
- 【圖 13】馬公港出水花草紋青花碗。圖片來源：同圖 11。
- 【圖 14】馬公港出水花草紋青花碗。圖片來源：同圖 11。
- 【圖 15】金門採集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金門地區使用的陶瓷器文化探源》，2005 年，頁 64。
- 【圖 16】海安路採集山水紋青花碗。圖片來源：《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討臺灣歷史》，2013 年，頁 276。
- 【圖 17】南明夫人洪氏墓出土兩件山水樓閣紋青花小罐。圖片來源：同上，頁 275。
- 【圖 18】安平熱蘭遮城出土唐津二彩器。圖片來源：〈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日本和東南亞陶瓷〉，2009 年，頁 13。
- 【圖 19】安平熱蘭遮城出土唐津二彩器。圖片來源：〈2005 年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肥前陶瓷〉，2005 年，頁 17。
- 【圖 20】十七世紀日本肥前窯瓷器出土遺址分布圖。圖片來源：筆者繪製。
- 【圖 21】外尾山窯跡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瓷盤。圖片來源：《有田の古窯一町内古窯跡詳細分布調査報告書第 11 集》，1998 年，頁 169。

- 【圖 22】柿右衛門窯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瓷盤。圖片來源：同上，頁 346。
- 【圖 23】馬尼拉市王城區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マニラ出土の肥前磁器〉，2005 年，頁 2。
- 【圖 24】咖啡園路遺址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1990 年，頁 122。
- 【圖 25】聖多明哥成修道院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Chinese Ceramics in the Audiencia of Guatemala*”，2002 年，頁 30。
- 【圖 26】墨西哥市大神廟出土開光花草紋盤。圖片來源：〈台灣海峽周邊的陶瓷貿易網絡與大帆船貿易〉，2012 年。
- 【圖 27】外山多々良の元窯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有田の古窯一町内古窯跡詳細分布調査報告書第 11 集》，1998 年，頁 232-245。
- 【圖 28】弥源次窯跡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同上，頁 194-197。
- 【圖 29】広瀬向窯跡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澎湖群島・金門島発見の肥前磁器〉，2003 年，頁 92。
- 【圖 30】吉田 2 号窯跡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1990 年，頁 96。
- 【圖 31】叭沙伊干遺址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同上，頁 158-160。
- 【圖 32】馬尼拉王城區西班牙時期遺址出土開光花草紋青花盤。圖片來源：〈澎湖群島・金門島発見の肥前磁器〉，2003 年，頁 92。
- 【圖 33】會安潘朱貞遺址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圖片來源：《昭和女子大學国際文化研究紀要 Vol. 4 —ベトナム日本町ホイアンの考古學調査》，1997 年，寫真圖版頁 21。
- 【圖 34】會安錦鋪亭遺址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圖片來源：同上，寫真圖版頁 15。
- 【圖 35】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淡路町二丁目遺跡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圖片來源：〈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淡路町二丁目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器—譜代大名屋敷地の一例—〉，2013 年，頁 59-74。
- 【圖 36】楠木谷窯跡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圖片來源：《平成 24 年度文化財特別展 徳川將軍 家の器 —江戸城跡の最新の発掘成果を美術品とともに—》，2014 年，頁 19。
- 【圖 37】天狗古窯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圖片來源：《国史跡天狗谷窯跡：史跡肥前磁器窯跡(天狗谷窯跡)保存整備事業報告書》，2010，頁 178、頁 193。
- 【圖 38】年木谷窯跡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圖片來源：《有田の古窯一町内古窯跡詳細分布調査報告書第 11 集》，1998 年，頁 34-39。
- 【圖 39】小樽窯跡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圖片來源：同上，頁 48-51。

- 【圖 40】山辺田窯跡出土日字鳳紋青花盤。圖片來源：同圖 38，頁 208、213。
- 【圖 41】湄南河畔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澎湖群島・金門島発見の肥前磁器〉，2003 年，頁 93。
- 【圖 42】會安錦鋪亭遺址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昭和女子大學国際文化研究紀要 Vol. 4—ベトナム日本町ホイアンの考古學調査》，1997 年，寫真圖版頁 15。
- 【圖 43】潘朱貞遺址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同上，寫真圖版頁 21。
- 【圖 44】東山冬古灣沉船出水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中國水下考古發現的十六至十七世紀外銷瓷及其相關問題〉，2012 年，頁 82-83。
- 【圖 45】頭噸號沉船出水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1992 年，頁 129。
- 【圖 46】弥源次窯跡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有田の古窯—町内古窯跡詳細分布調査報告書第 11 集》，1998 年，頁 197。
- 【圖 47】多夕良の元窯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同上，頁 241。
- 【圖 48】天狗谷窯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同圖 46，頁 95。
- 【圖 49】南川原地區古窯跡出土簡筆雲龍紋青花碗。圖片來源：《考古資料展 4 有田焼の考古学図録 窯跡資料にみる有田焼の変遷—有田・南川原窯ノ辻窯跡出土の陶磁器—》，2010 年，頁 47。
- 【圖 50】泰國洛坤府的濤坤寺出土之花草枝鳥紋小罐。圖片來源：〈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1990 年，頁 151。
- 【圖 51】有田町外山地區多多良之元窯跡出土山水紋青花瓶。圖片來源：《有田の古窯—町内古窯跡詳細分布調査報告書第 11 集》，1998 年，頁 138。
- 【圖 52】根津美術館藏二彩唐津燒。圖片來源：《知られざる唐津—二彩・單色釉・三島手》，2002，圖 34。

參考文獻

大橋康二，1985，〈鹿児島県吹上浜採集の陶磁片〉，收於三上次男博士喜寿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三上次男博士喜寿記念論文集》陶磁編，東京：平凡社，275-291。

——，1989，〈十七世紀後半における肥前磁器の銘款について：長吉谷窯出土品を中心として〉，《東洋陶磁》17：25-27。

——，1990，〈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海を渡っ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佐賀：九州陶磁文化館。

大橋康二、坂井隆，1999，〈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82：47-94。

千代田区立日比谷図書文化館，2014，《平成24年度文化財特別展 徳川将軍 家の器—江戸城跡の最新の発掘成果を美術品とともに—》，東京：千代田区立日比谷図書文化館。

山本盤男，2005，〈近世肥前磁器輸出に関する経済史研究の成果と課題〉，收於《九州産業大学柿右衛門様式陶芸研究センター論集》，福岡：九州産業大学柿右衛門様式陶芸研究センター編集委員会，263-274。

方真真，2003，〈明鄭時代台灣與菲律賓的貿易關係—以馬尼拉海關紀錄為中心〉，《臺灣文獻》54(3)：59-105。

石萬壽，1991，《台灣早期開發史·雲嘉南地區》，臺北：臺灣省教育廳。

朱正宜、陳俊男等，2010，《新寮遺址搶救發掘研究計畫期末報告》，臺南：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有田町教育委員会，2010，《国史跡天狗谷窯跡：史跡肥前磁器窯跡（天狗谷窯跡）保存整備事業報告書》，佐賀：有田町教育委員会。

李匡悌，2005，《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劃期末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匡悌、盧泰康、朱正宜、臧振華，2006，〈試論台南地區出土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收於

郭聖偉，2016，〈臺灣出土十七世紀中晚期日本肥前窯瓷器與其意義〉，《南藝學報》12：39-72

《2005 年台灣考古工作會報》，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10-1-17。

村上伸之、野上建紀編著，1988，《有田の古窯一町内古窯跡詳細分布調査報告書第 11 集》，佐賀：有田町教育委員会。

——，2002，《幸平遺跡—佐賀県西松浦郡有田町幸平二丁目 1521・1522 番地の調査》，佐賀：有田町教育委員会。

坂井隆，2004，〈肥前磁器(伊万里)の発展と 17 世紀後半のアジア陶磁貿易出土資料〉，《田野考古》9 (1/2)：1-18。

林金榮，2005，《金門地區使用的陶瓷器文化探源》，金門：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東京大学埋蔵文化財調査室，1989，《東京大学本郷構内の遺跡理学部 7 号館地点》，東京：東京大学埋蔵文化財調査室。

范勝雄，1997，《府城叢談（1）》，臺南：臺南市政府。

栗建安，2012，〈中國水下考古發現的十六至十七世紀外銷瓷及其相關問題〉，收於鄭培凱主編，《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陶瓷外銷與物質文明擴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2-83。

根津美術館，2002，《知られざる唐津—二彩・單色釉・三島手》，東京：根津美術館。

野上建紀，〈台灣海峽周邊的陶瓷貿易網絡與大帆船貿易〉，2012，《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論文》（未出版）。

野上建紀、Alfredo B. Orogo、田中和彦、洪曉純，2005，〈マニラ出土的肥前磁器〉，《金大考古》48：1-5。

野上建紀、Judith Hernández Aranda，2011，〈ベラクルス出土の肥前磁器〉，《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32：47-50。

郭聖偉，2014，《臺南中寮遺址出土陶瓷及相關研究》，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碩士班碩士論文。

連橫，1979，《臺灣通史》，臺北：眾文圖書。

郭聖偉，2016，〈臺灣出土十七世紀中晚期日本肥前窯瓷器與其意義〉，《南藝學報》12：39-72

菊池誠一編，1997，《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紀要 Vol. 4—ベトナム日本町ホイアンの考古學調査》，世田谷：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

傅朝卿，2001，《台南市古蹟與歷史建築總覽》，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

曾光正，2011，《清代鳳山縣舊城城內空間調查研究》，高雄市文化局委託，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執行。

趙金勇，2012，〈導言〉，《考古人類學刊「臺灣歷史考古」專號》76：1-4。

鈴木裕子，2013，〈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淡路町二丁目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器—譜代大名屋敷地の一例—〉，收於《第34回日本貿易陶磁研究会研究集会『近世都市江戸の貿易陶磁器』発表要旨》，東京：本陶瓷貿易研究会，59-74。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編，1989，《民族文物館藏品選集》，臺南：臺南市政府。

臧振華、李匡悌，2011，《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考古遺址受開發 影響部分搶救發掘計畫報告》，聯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

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1993，〈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3)：763-865。

劉益昌、王淑津，2005，〈2005年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肥前陶瓷〉，《熱蘭遮城考古試掘計畫通訊月刊》13(10)：14-21。

劉慧蘭，2003，《十九世紀以前湖內鄉社會經濟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駒澤大學禪文化歷史博物館，2010，《考古資料展4 有田焼の考古学図録 窯跡資料にみる有田焼の変遷—有田・南川原窯ノ辻窯跡出土の陶磁器—》，東京：駒澤大學禪文化歷史博物館。

盧泰康、李匡悌、王竹平，2010，《臺南社內遺址出土金屬器形制與製作工藝研究》，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盧泰康，2008，〈澎湖所見的肥前瓷器〉，《金大考古》61：1-2。

——，2012，〈澎湖馬公港出水「棹銅」考〉，《南藝學報》4：83-123。

- 郭聖偉，2016，〈臺灣出土十七世紀中晚期日本肥前窯瓷器與其意義〉，《南藝學報》12：39-72
- ，2013，《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討臺灣歷史》，臺北：花木蘭出版社。
- ，2013，〈明代中國陶瓷外銷的歷程與分期〉，收於沈瓊華主編，《2012'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古代瓷器輸出及文化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浙江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401-414。
- 盧泰康、野上建紀，2003，〈澎湖群島·金門島発見の肥前磁器〉，《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30：90-100。
- ，2008，〈澎湖馬公港與金門所發現的肥前瓷器〉，《史物論壇》6：93-119。
- 謝明良，2009，〈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日本和東南亞陶瓷〉，《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30：3-16。
- ，2008，〈澎湖發現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故宮文物月刊》303：102-113。
- ，1996，〈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台灣史研究》3(1)：229-244。
- Christie's Amsterdam B. V. 1992. *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msterdam: Christie's Amsterdam B. V.
- George Kuwayama, and Anthony Pasinski. 2002.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Audiencia of Guatemala," *Oriental Art*, XLV(4):25-35.
- Sawang Lertrit And Kritsada Pinsri Pariwat Thamm-apreechakorn. 1996. *Ceramic Art in Thailand.*, Bangkok: Osotspa Co.